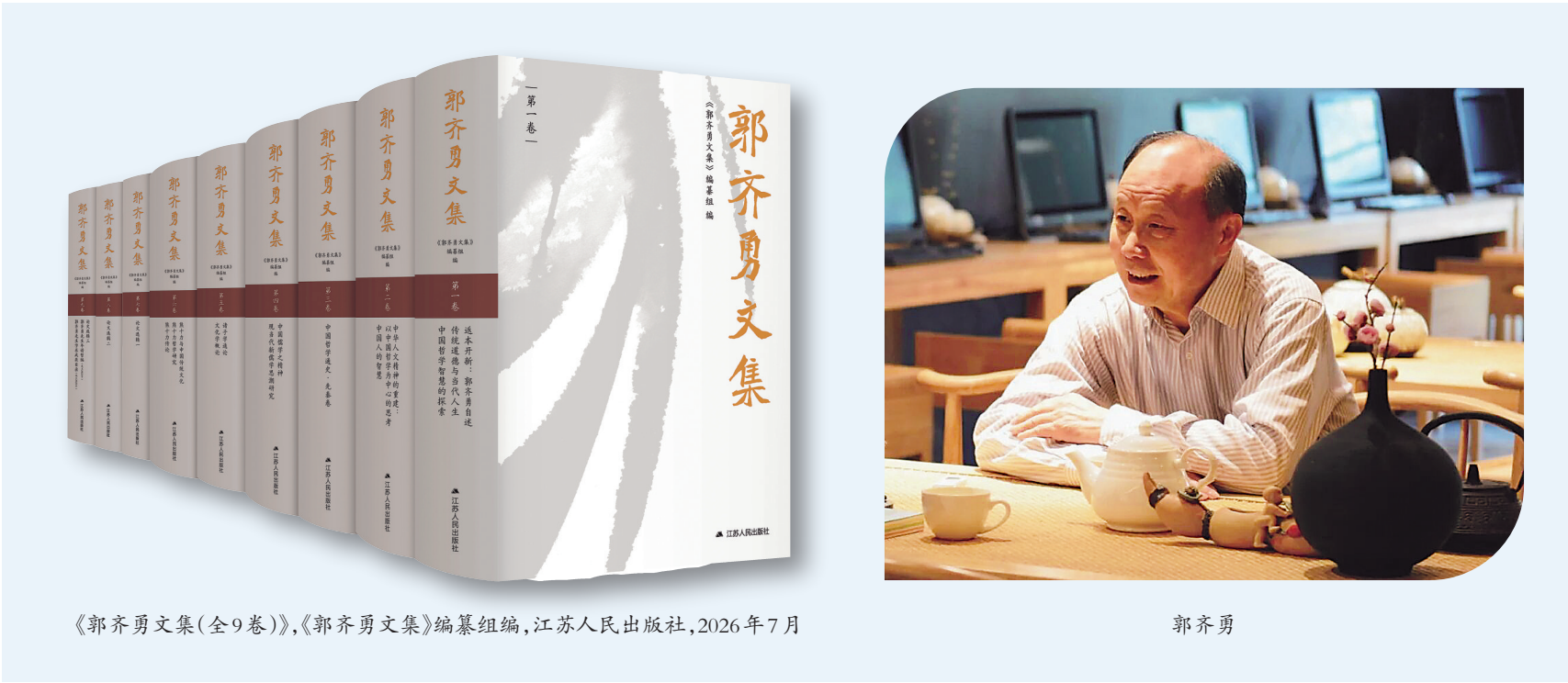


承斯文正脉 启时代新知

——《郭齐勇文集(全9卷)》读后絮谈

□ 府建明



《郭齐勇文集(全9卷)》,《郭齐勇文集》编纂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6年7月

今年7月中旬,我在西藏出差时,收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张欣的微信,告知我《郭齐勇文集(全9卷)》(以下简称《文集》)已经出版。回家后不久,我便收到了样书,沉甸甸的一箱。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仔细端详其整体装帧,发觉比之前在照片上看到的更为雅致。随后逐一翻阅各册,深感设计精美、编排精当,实在令人心生欢喜。编辑们为此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作为这个项目的牵线人,我感到十分欣慰,不禁回想起当初促成出版的因緣。

—

2022年9月17日,《中国哲学通史》(10卷本)新书发布会在湖北武汉举行。这套书由我策划,并邀请郭齐勇先生担任主编,历时15年之久方得面世,殊为不易。为此,我俩都格外高兴,分别代表作者方和编辑方作了深情发言。会议结束后,多数代表当日返程,我因胡治洪兄的盛情挽留,决定次日午聚后再走。治洪兄是老熟人,他早年曾任湖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后师从郭齐勇先生攻读博士,并调入武大,独立承担了《中国哲学通史·现代卷》的写作任务。次日的午聚中,治洪兄邀请了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孙劲松,两人在席间谈到正在整理郭齐勇先生的文稿,计划出版《郭齐勇文集》,然而如何寻觅合适的出版社,颇费思量。他们委婉地提出,能否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一是凭借合作出版《中国哲学通史》的机缘,二是看重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力量。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郭齐勇先生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确实到了总结其学术成就的时候。

之后,我将此事转告时任社领导,并阐述了出版这一项目的意义,大致有两点:其一,郭齐勇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代表性学者,尤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人所共知,出版其文集,既有传承学脉之功,亦具推动学术发展之效,必将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其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的主旋律,郭先生致力于国学研究与普及40余年,其诸多思想和观点精辟独到,有助于广大读者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而言,出版该项目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社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当即应允,随即与武汉大学国学院接洽,很快达成了出版协议。随后,国学院成立编纂组,全面展开文稿的收集与整理;江苏人民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组建编辑团队,精心编校。我虽未参与具体的编辑工作,但始终关注其

进展,社里的编辑也不时向我反馈情况。如今这套书终于面世,实在令人欣慰。

平心而论,从出版周期来看,如此体量的项目,总计600余万字,能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完成,堪称高效。这一项目堪称编纂方与出版方精诚合作的又一典范,值得同类项目借鉴。

二

说到《文集》的特点,可用“体例允洽,内容丰赡”8个字来概括。所谓“体例允洽”,是指全书分类清晰、编集有序。书首载有《〈郭齐勇文集〉内容概述及编纂说明》一文,方便读者了解全书内容及郭氏学术成就;第一卷以《返本开新:郭齐勇自述》作为开篇,可令读者先行理解郭氏的心路历程与学术旨趣;专著、论文按内容和主题各自归类,眉目清晰;书后所附《郭齐勇先生年谱汇编》和《郭齐勇先生学术成果目录》,则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所谓“内容丰赡”,是指收录了郭氏迄今为止的主要学术成果,据编纂组总结,包括“熊十力与现代新儒学研究”“文化与诸子学探讨”“出土文献与经学范式探析”“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家新研”及诸多国学普及方面的著论。由此,不能不说到郭齐勇先生的学术路向、学术风格与学术贡献。

郭齐勇出生于1947年,属于常说的“老三届”,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后提前一年考上硕士研究生,师从萧蓬父、李德永、唐明邦三位先生。继而留校任教,并随萧蓬父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升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后一直在武大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哲学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等职。他的学术生涯,从研究熊十力起步,继而拓展至现当代新儒学。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激荡下,通过积极参与和研习,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全面体认。90年代后期,研究重心前移,对先秦儒学及出土文献、宋明儒学等领域全面展开,并因教学之需撰写出《中国哲学史》教材,贯通了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文化史,进而应我之邀,主编了10卷本的《中国哲学通史》,可谓集其学术研究之大成。

由此看来,郭齐勇的学术路向与传统主张的“由博返约”正相反,可以称之为“由约及博”。这当然与他的经历有关,但也构成了他的学术底色——始终充满问题意识。他所切入的近现代,正值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如何对待中华文化亦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熊十力及其新儒家以守成开新的态度卫



郭齐勇

护传统文化,显然给了郭齐勇很大启发,也使他始终关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现实意义。《文集》中收录的《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等著作,都鲜明地反映了他在此方面的心得,即使是《诸子学通论》《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一类的专论,也透着这种气息。

三

郭齐勇的学术风格,继承了前辈学者倡导的“三重”(即义理、考据、辞章)传统。重义理自不必说,这是他作为哲学史家的本色;重考据,典型地体现在他对郭店竹简等出土文献的研究中;重辞章,表现在他无论撰写学术专著还是通俗读物,行文皆无晦涩之感,这在当今学界中颇为难得,但更为难得的是他对中国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他立志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便以“温情的敬意”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既强调守成的重要性,又“好古”而不“泥古”,始终主张对传统文化“去芜存菁,作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这与某些激进的复古者或食古不化的迂腐者迥然不同。正因如此,在几次学术会议上,我听到郭齐勇的发言,都颇具敦厚君子之风。有人将郭齐勇归为“中道稳健”派的儒学研究代表人物,我认为是很恰当的。不过我更愿意用“温情中庸”来形容他,这似乎更符合他所从事的专业及其个性。

对于郭齐勇的学术成就,《文集》编纂组在书首的《说明》中已作了较详尽的概括和论述,颇为允当。若从更为宏阔的视角审视其学术贡献,我认为主要有三:其一,以近现代新儒学为切入点,“扣其两端”(即上溯古代、下及当代),通过专题学术研究、中国哲学史教学及人才培养等工作,大力推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其二,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包括论辩),以及参与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特别是主编大型《中国哲学通史》,为确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三,通过举办国学班、创立古典学专业,以及开展各类社会活动,为国学普及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郭齐勇先生以博雅君子的风范,很好地诠释了孔子的这句话。我与他相识30余年,对其学问、人品深为钦敬,因此不揣浅陋,写下以上文字。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

数智时代,如何“虚拟存在”

□ 陈 颖

2025年底,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用户已突破6亿。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智能体(AI Agent)正在重塑我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我们被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推向一个“虚实倒置”的数智时代。虚拟生存不再是对现实的补充,而日益成为我们交往、行动乃至感知世界的常态。在这场数字洪流中,我们不禁要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我”的很大一部分存在于数据与算法构建的虚拟之中时,“我”究竟是谁?“我”的存在又意味着什么?杜骏飞教授的新作《我虚拟,故我在》,正是对这一时代之间的深刻回应。近30年来,从《弥漫的传播》到《数字交往论》直至《我虚拟,故我在》,作者始终以学术思考关怀现实生活,创新传播学研究视角,作出诸多开创性的学术尝试。《我虚拟,故我在》立足哲学、传播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视野,以书名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致敬,深入探讨了“人类身处数智时代应如何发展自我”这一命题,可谓一部探讨人类在数智时代如何“虚拟存在”的思想报告与生存指南。

该书的核心在于其对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哲学思辨,具有深刻的学理性与前瞻性。阅读这本书,不仅是一次烧脑的学术挑战,更是一场关乎我们何以成人、何以生存的思想对话。书中并未停留在对技术现象的浅层描摹,而是深入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幽微之处,提出“拟在”“先心一后心”“赛博心灵”“数



字人类世”“交往人类主义”等一系列具有科幻色彩的原创性概念,为理解数智时代的人类境遇搭建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框架。

在存在论层面,作者以“拟在”概念统称虚拟现实与虚拟存在,指出虚拟并非“空无”,而是一种“被生成的现实”,是“更大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心

灵观层面,书中追问:数字形态中是否可能拥有心灵?进而,在生命观与主体论层面,脑机接口、意识上传等议题已从科幻走向学术前沿。当非生物体存在被视为“生命”的可能,当AI智能体(Agent)展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性,我们如何重新定义生命与主体?作者提出“共主体”(人机融合)、“它主体”(机器觉醒)与“云主体”(集群意志)等概念,警示我们在拥抱技术演化的同时,也面临主体性被分布式网络、“机器觉醒”乃至技术寡头稀释或操控的风险。最后,在生死观层面,作者将思考推向终极,指出技术正在重构我们的生死观,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数字化的“死亡”中守护人的尊严。

该书洋溢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与批判精神。在技术狂飙的喧嚣中,作者始终保持清醒与警觉:我们既要拥抱技术、拓展生存,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守护人的主体性、尊严与价值理性。《我虚拟,故我在》既是一张精密的“思想地图”,帮助我们理解正在经历的生存变革;也是一剂“哲学疫苗”,让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反思背后的伦理困境与认知风险,从而抵御虚拟洪流带来的自我迷失。这部在数智时代转折点上应运而生的力作,以其思想的深度、视野的广度与人文的温度,为我们理解自我乃至人类生存的意义,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思辨力量。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政治图书出版中心主任、副编审)

■ 编辑手记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十年过去,越来越多学者立足中国实践发出中国声音。《全球南方:中国视角》尝试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中国学者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和方法参与世界性议题的讨论。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所言,该书“为这一宏大叙事贡献了扎实的中国智慧,有力回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唤”。这份回应,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当我2025年秋天拿到李安山教授的书稿时,距离2024年底的约稿不过10个月,对一部4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而言,这个速度不算慢。但李老师为这本书所做的思想准备,其实已经跨越了数十载。

这份跨时空的积累,也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李老师之间近20年的学术缘分密不可分。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2007年,钱乘旦老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现代化历程》十卷本,其中非洲卷的作者正是李安山老师。从那以后,从《世界现代化历程·非洲卷》到《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再到130万言的《非洲现代史》,李老师将他最重要的一系列学术著作都交付给了我们社。这份沉甸甸的信任,离不开王保顶社长多年来的悉心耕耘与真诚维系。

也正是基于这份深厚的合作基础,当2024年底李老师那篇关于“全球南方”的文章刊发于《北京大学校报》时,王社长第一时间便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议题的延展空间,随即联系李老师,希望将其扩展为一部专著。李老师爽快地应允了。作为接手的编辑,我深知这份信任的分量。它不仅来自一次及时的约稿,更来自近20年彼此砥砺、共同成长的学术情谊,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负这份托付,让这部凝聚着数十年思考的著作,以最扎实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书稿送来时,我的第一感受是:每个概念都有来历,每项论证都有充足的资料支撑。李老师是多伦多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他写东西不讲“大话”。比如“全球南方”一词的出处,他追溯到1969年美国左翼活动家奥格尔斯比的文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的报告,他也逐字研读过。这些功夫不是为了显示学问有多深,而是一个历史学者对概念刨根问底的执着。

编辑过程中,我们在结构上进行了不少沟通。40多万字的篇幅,作者反复打磨,但个别内容在不同章节中仍有交叉,也在所难免。通读全稿后,我对行文架构提出了一些建议,李老师都予以认可。随后,为打消我的顾虑,他回复说:“你是一个从编辑角度看全稿的人,你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到位,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请务必在相应地方标出建议,不要有顾虑,我会认真考虑的。”之后,我把审稿意见详细整理好发给他,几天后他便给出了修改方案,或归并调整,或干脆重写。这种对学术的认真和对编辑的尊重,让我印象深刻。

“全球南方”这个词近年来频繁出现在国际舆论场,但很多讨论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政治标签,好像把“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换了个新名字就能解释一切。李老师要做的,恰恰是打破这种简单化的认知。他在梳理学术史时指出,目前“全球南方”已成为构建学术研究框架的工具,它不是被动的标签,而是一个拥有历史延续性和现实动态性的主体。

全书按“概念—历史—现实”的递进逻辑展开:先梳理“南方”从地理概念到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再回溯古老文明、殖民扩张、奴隶贸易与反殖民斗争,揭示不平等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最后回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变革的当下,探讨南方国家话语权的上升。李老师特别提出,全球化从来不是西方单向扩展的历史,在全球南方日益崛起的今天,“欧洲/西方中心论”受到各方面挑战。“文明”一词在近代已被种族化和殖民化,成为使殖民统治合法化的道德话语,与之相伴的是西方/东方、文明/野蛮、发展/停滞这一整套二元对立框架。“全球南方”的意义,恰恰在于“找回南方”,矫正西方中心主义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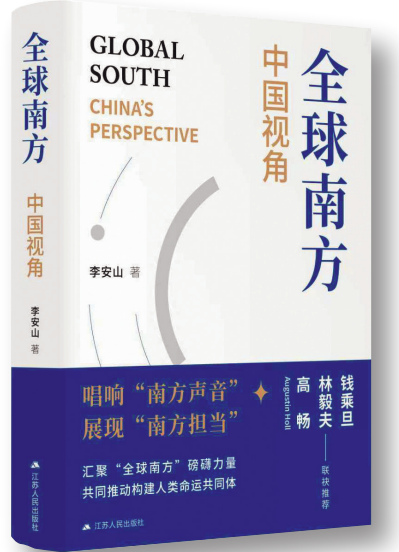
对于书名中的“中国视角”,李老师在前言中明确提出,这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基于“人类情怀、中国立场、对全球南方的关切”这三重维度,展现中国人如何看待和研究“全球南方”。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不是靠北方“认定”,而是基于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现实诉求,以及中国一贯的立场、积极实践和广泛的国际认可。正如法国学者布鲁诺·吉格所说,中国对“什么是发展,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好的治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西方主流媒体和研究机构并未予以重视。李老师的工作,就是把那些被忽视的答案呈现出来。

今年5月,《全球南方:中国视角》入选“中国好书”4月推荐书目。随后,我社开始推进多语种版权输出工作,与泰国、吉尔吉斯斯坦、埃及、法国等国的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关系。一本讲述“全球南方”的著作,正在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不仅是对李老师学术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国学术界与出版界共同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一次具体实践,为国际社会讨论全球南方议题拓展了新的学术空间。这让我想到李老师常说的话:“一部著作的好坏,最好还是由读者去评判。”如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即将读到这本书,这或许正是对它最好的检验。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

当『全球南方』成为世界议题

□ 李 旭



《全球南方:中国视角》,李安山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